

厦門大学校史纲要

上 编

(讨论稿)

校史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四月

说 明

厦门大学建校六十五年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编写这部校史，工程甚为浩大。这个《纲要》，仅提供厦门大学创立和发展的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旨在征求各方面意见，以便将来着手这一工程的正式“施工”时，有个基础。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上时间匆促，一定存在不少错漏之处，敬希校友和读者指正。

本《纲要》上编为私立时期（1921—1937）至国立时期（1937—1949）部分，由校宣传部黄宗实同志执笔，编写时参考了1980年9月原校史编写组所写的《厦门大学校史》（初稿），谨此说明。

目 录

第一章 私立时期

第一节	创立经过	(1)
第二节	组织机构与学科设置	(2)
第三节	教学、科学研究与办学特色	(4)
第四节	学生自治会与学生课外活动	(6)
第五节	学运与爱国反帝斗争	(6)

第二章 抗战时期

第一节	厦大改为国立大学	(7)
第二节	学校内迁山城长汀	(8)
第三节	院系设置和教学活动	(9)
第四节	学科扩展与办学特色	(12)
第五节	抗日救亡运动	(12)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节	复员前后	(14)
第二节	行政组织和院系设置	(15)
第三节	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	(15)
第四节	学生运动	(17)
第五节	黎明前的战斗	(18)

厦门大学校史纲要

第一章 私立时期（1921—1937）

第一节 创立经过

厦门大学是祖国东南一所全国重点的综合性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一面光辉旗帜。从一九二一年四月创办起，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是厦大的私立时期。

爱国兴学，是陈嘉庚一生中最主要的“为公众服务”的活动之一。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因此，从一九一三年开始，在家乡同安县集美社（今集美镇）创办了集美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了集美师范、中学、水产、商科、幼稚园、航海、农林等校。一九二一年定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一九二三年十月，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批准，承认集美学校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

集美学校的发展，加强了陈嘉庚爱国兴学的信心。他深感祖国的贫穷落后，而要改变这种面貌，必须培养大批的专门人才。他把高等学校比喻为机器中的发动机，中小学好比是它的附属品，“欲求附属品之发达，非赖有完全之发动机不可。”中学师资的来源，有赖于大学的培养。因此，在他一九一九年第五次回国时，就决意要创办一所大学。六月，他选定厦门演武场为大学校址，草拟为筹办厦门大学而召开特别大会的通告，表示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因此“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七月十三日，在厦门“陈氏宗祠”召集筹办发起人会议。会上，陈嘉庚表示了他创办厦门大学的决心和信心。他说：“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他要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致力于为祖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一崇高事业。在会上，他认捐了学校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三百万元（分十二年付款，每年二十五万元）。

一九二〇年十月，陈嘉庚到上海，聘请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任之、李登辉、邓芝园以及汪精卫、郭鸿声、余日章、胡敦复、黄孟珪、叶采真等十人为筹备员，举行筹备创办厦门大学会议。不久，成立了校董会，聘请邓芝园为首任校长。接着，经向福建省政府申请，获准拨给厦门南普陀寺毗连之演武场一带官地为校址，并即着手设计校舍建筑蓝图，筹划建校事宜。

邓芝园就任后，开始拟订学校大纲，确定办学宗旨，设置行政机构，筹划校舍建

筑，延聘教员，以“自强不息”为校训，在郑贞文作词、赵元任谱曲的《私立厦门大学校歌》中，号召师生共同努力，把厦大办成“南方之强”。

初创时，设师范、商学两部，师范部内分文理两科，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厦门和南洋各埠招收预科新生九十八名。四月六日，暂借集美学校“即温楼”举行开校式。校长和教员刘树杞、周辨明、黄开宗、周予同、郑天挺、钟心焯等十余人，均在集美授课。五月九日，即“五九”国耻纪念日，全校师生齐集厦门演武场校址举行校舍奠基典礼，从此开始建筑校舍。

开学后一个月，邓芝园因故辞职，陈嘉庚即电请在新加坡的林文庆博士接长厦大。六月底，林文庆抵厦，正式到校视事。

林文庆就任后，重新修订厦门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校的进行目标、学科设置、校务管理条例等。同时绘制校徽，确立“止于至善”为校训，指出“本大学之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完善之文化”。

同年八月，学校又增收预科新生三十八名，至此，在校学生为一百三十六名。一九二二年二月，新校舍“映雪楼”首告竣工，全体师生由集美迁入新校舍上课。七月，增设了工学、新闻学两部，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学。

校舍的建筑，是创办时期学校一项基本建设。从一九二一年奠基，至翌年二月，“映雪楼”竣工，七月，“集美楼”、“群贤楼”和“同安楼”相继落成，一九二三年，“囊萤楼”也完工。这样，五座一字形排列、坐北向南的新校舍主体建筑就完成了。一九二五年，理化院大楼和生物院大楼相继竣工。至一九三一年十周年校庆时，学校总建筑面积已达五六万平方米，计有八楼（五座主体大楼加“兼爱楼”、“博学楼”和“笃行楼”）、二院（理化院和生物院两座大楼）、一厂（发电厂）、一附校（模范小学）、白城山教工眷属宿舍二十余座，以及东西膳厅等附属建筑。共四十多座楼房，三千多间房舍，基本满足了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的需要。十年间总计支出的建筑费达一百多万元。

学校经费来源，建校初期，一切费用几乎全由陈嘉庚及其弟陈敬贤独力支付。学校到一九二八年共支出的建筑费和常年费为二百五十六万多元。一九二七年八月起，又有华侨黄奕住、曾江水、黄廷元、李光前、叶玉堆、新加坡群进公司及林文庆校长，先后捐助本校经费二十多万元。一九三〇年以后，当时政府才决定给予少量资助。

第二节 组织机构与学科设置

校董会为私立时期厦门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校董的人员组成有：名誉校董、永久

校董、当然校董及校董四种。名誉校董不限人数，永久校董为学校创办人。在《私立厦门大学校董会章程》中规定，“本会之职权如左：1. 筹划本大学经费及基金；2. 保管本大学财产；3. 监察本大学财务；4. 审核本大学预决算；5. 选任本大学校长；6. 聘任校长提议及其他重要事务。”《章程》还规定名誉校董和校董当选的资格、条件是：

“1. 凡捐资本大学五万元以上者；2. 曾经研究教育或办理教育者；3. 热心教育、对于本大学特别赞助者。”

建校初期，校董会以陈嘉庚为永久校董，校长林文庆为当然校董。名誉校董为曾江水。一九三五年重新组织校董会，由学校函聘汪兆铭、孙科、宋子文、王世杰、孔祥熙、黄奕住、曾江水为名誉校董；陈敬贤、林文庆、陈延谦、李俊承、黄廷元、黄伯权、洪朝焕、黄鸿翔、林鼎礼为校董。

在董事会领导下，设校长一人，对外代表全校，对内主持校务。学校评议会，则是学校最高立法机关，由校长、副校长、各科（后改为学院）主任、各处主任、大学秘书、校长室秘书及副教授以上教师代表组成。校长下设秘书长、审计员、教务处、总务处及各种委员会，如预算编制及审查委员会，校舍建筑及设备委员会，招生委员会，试验委员会等。教务处下辖本科各学部（以后改为学系）、预科及研究院。校长还充当学校评议会主席。

学科设置方面，开办之初设师范商学两部，目的在为地方教育培养师资。文、理两科在部内附设。后来因本校与当时其它大学编制不合，遂于一九二一年秋季起，将师范部改为教育学部，附设的文理两科分出改为两学部，即文部和理部。一九二二年七月，又增设医药、新闻、工学诸学部。一九二三年各学部改称为科。一九二四年将教育、商学、新闻等科并入文科，工科并入理科，原来的科改称学系。一九二六年又增设法科，并将原隶属于文科的政治、经济两学系并入法科。八月，为提倡国学，推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学校延聘林语堂、鲁迅等一批名教授来校，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一九二七年三月，国学院停办。学科设置经过不断调整、扩展，至一九三〇年四月，全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社会学、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原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方法学、银行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学等二十一个系，同时将原设的预科改为高级中学，并附设实验小学。是年秋季，天文学系因缺师资而停办。至一九三一年四月，校庆十周年时，本校设有文、理、法、教育、商五个学院二十个系，并附设高中和实验小学。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学科设置又有变动。其中较大的调整是，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两系并为历史社会学系；教育学院撤销，其属下的四学系合为教育学系，同时并入文学院；理学院的动物、植物两系并为生物学系；法学院之政治、经济两系合为政治经济学系；商学院原属三系并为商业学系，同时将法、商

两学院合并为法商学院，一九三七年春季，全校设有三学院九个系，即文学院（文学、历史社会学、教育学三系）、理学院（数理、化学、生物学三系）和法商学院（法律、政治经济学、商业学三系）。一九三七年秋季，学校改为国立时，院系设置仍依旧制，唯法商学院之法律系奉令停办。

第三节 教学、科学研究与办学特色

私立时期，由于经费比较充足，教职员的薪俸收入比较稳定，因此，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应聘来校任教，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初创时，全校教职员仅七十多名，其中教授副教授三十多名，多为留美学生；一九三一年校庆十周年时，已增加到一百二十多名，其中正副教授四十多名。先后来校任教的国内著名教授学者有文科的陈衍、周辨明、徐声金、余霁、罗常培、沈兼士、孙伏园、丁山、林语堂、鲁迅、顾颉刚、周予同、孙贵定、朱君毅、朱谦之、姜琦、陈定谟、陈德恒、容肇祖；理科方面的刘树杞、钟心熹、秉志（农山）、余青松、钱崇澍、陈子英、姜立夫、张资珙、刘椽、杨克纯等。他们给学校带来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良好风气，使得学校的声誉日增。这一情况，使陈嘉庚所提出的“教师之训练，为今日大学教育之最大责任，非如是，则在此混乱不振之中国，教育实无进步之可言”的愿望，在创办厦大过程中得到实现。

教学方面，学校一贯重视建立正常的秩序，因而除规定了学制（本科四年，预科二年）外，对各学科设置、学程安排、学生基本学则、学籍管理以至纪律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学生入学，要经过严格的基本知识试验和体格检查，同时必须缴纳各种费用。私立时期学生从最初的一百三十多人，到一九三六年，增加到三百二十多人。从一九二六年开始，本校始有本科毕业生。至一九三六年，共毕业十二届，毕业生总计为五百七十一人。其中，多数人从事教育工作，也有一部分从事工商业或到海外谋生的。他们当中，有一些经过工作实践，成为蜚声学界的专家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目录学家张秀民，动物学家伍献文、徐锡藩、顾瑞岩、汤独新，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康白（即陈运煌），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化学家卢嘉锡，遗传学家方宗熙，因明学家、诗人虞愚以及现在本校任教的史学家傅家麟（衣凌），化学家蔡启瑞等。

本校为爱国华侨陈嘉庚所创办，并得到海外广大华侨的资助，加之本校地处厦门侨乡，同海外在历史上和地理环境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学校创办时，就在大纲中明确规定：“本大学与海外各埠华侨关系甚深，故予华侨子弟以返国求学之机会，俾得发扬其眷爱祖国之热忱，使国内外之民族精神得以团结”。开办时就向新加坡、马尼拉等地招收华侨子弟入学。在厦的华侨学生还组织了华侨学会，开展各种爱国爱乡、促进学习的活动。学校每年都有毕业生到南洋去，为侨居地服务。如本校毕业生林惠祥、陈育

崧(第一届)、庄材保(第十届)、方宗熙(十一届)等都到过或长期在南洋教育界服务。

除了在人才培养方面同南洋的联系外,本校还注意研究南洋问题。“校旨”中提出,“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华侨之状况,以图将来之发展及进步。”本校林惠祥教授就在南洋马来亚、印尼等地从事人类学和民俗学、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后来还将搜集的南洋群岛的文物,在本校建立文化陈列所。此外,本校还加强同南洋各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创办后第二年,林文庆校长就带领本校代表团,到菲律宾大学考察访问。之后,也请南洋的学者来校访问或作学术报告等。

科研方面,私立时期注重结合本校的特点,着重人文科学中的教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海洋生物学的研究。当时,教育学院聘请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学家来校任教,除前述的孙贵定、朱君毅外,还有杜佐周、邱椿、雷通群、吴家镇、陈懿祝、李相勗、钟鲁斋等。他们除了任课外,还从事于教育学的著述和组织中小学教育的考察调查等活动。在教育著译方面,据一九三二年统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就有杜佐周的《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钟鲁斋的《小学各科教学新法之研究》,雷通群的《教育社会学》,姜琦译著的《视学纲要》,还有朱君毅的《历代人民之地理分布》,杜佐周的《闽省教育经费之调查》,钟鲁斋的《两性学习差异之调查》等。该院还出版不定期的《厦门大学教育学院丛刊》。由于该院科学研究的成绩显著,中央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都拨款补助教育学院的研究经费。自然科学方面,由于本校所处的地理环境,濒临海滨,内通大陆,外接重洋,在海洋科学的研究和海洋开发方面,有着优越条件。本校生物系的各种动植物标本,收集的数量和种类均冠于全国,其中文昌鱼标本被认为是研究动物学的“活化石”,不仅供应国内各大学,还出口欧美各国。一九三〇年夏季开始,本校生物学系同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联合在厦门举办了暑期生物研究会,以后又连续举行了三届。同年七月在厦门联合发起成立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在本校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场,从事有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的研究。一九三四年,动物系完成了福建沿海十七县的渔业调查。一九三五年,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委托本校成立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

为了提供科研成果的出版、发表和应用的条件,学校还出版了《厦门大学学报》、《国学季刊》、《自然科学丛刊》、《民众科学》、《海产生物学集刊》、《海产生物研究场报告》、《生物知识》以及有关数学、商学、法学等期刊。此外,还由本校编译处编辑供本校及其他高等学校作为教材的“大学丛书”,分别按学科出版本校教师所编写的教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

第四节 学生自治会与学生课外活动

学校鼓励学生建立自治会组织，以辅助学校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学生自治会在全校设学生会总会，各学院又有学生会。学生自治会总会设纠察部，出版部、膳食部、文书部、会计部、庶务部、交际部、游艺部和体育部，各部设委员若干名，学生会总委员会委员任期一学年，一般在每学年度下学期产生下一届新的委员会。学生自治会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如设置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娱活动，组织参与重要节日的庆典活动，以及对学生日常生活的指导，培养自治能力。

学生课外活动，旨在鼓励他们“一方面提倡课余娱乐，以改进其生活；一方面增进办事能力，以为将来服务社会之准备”。主要的课外活动有：（一）周会，经常请本校教授或校外名人作演讲；（二）同学会及级会，以学院（高中四年级）组织同学会，如理科同学会等，经常举行各种活动；（三）学会，以学科组织的课外学术活动组织，如文学会，算学会，教育学会等；（四）语文演讲辩论会，旨在提高学生的中文和英语的口语表达能力；（五）各种体育活动；（六）参观；（七）摄影和歌咏等活动；（八）业余戏剧活动，创作和演出戏剧节目等；（九）出版刊物，如《文科半月刊》，《鼓浪》，《生物学会期刊》等。

第五节 学运与爱国反帝斗争

二十年代，由于“五四”运动之后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和“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的影响，青年学生对教育制度的落后守旧方面，已表现出一种要求革新的精神。

林文庆作为厦大实际上的第一任校长，他对于厦大的创立、教学和科学研究体制的逐步完善、为祖国培养人才，谋求学校的发展，以及协助陈嘉庚为学校募集经费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虽然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但是在对待民族文化上却表现比较守旧，提倡“尊孔”，这种思想，就和学生要求学校管理制度上的某些改进发生了矛盾。一九二四年，就曾发生过全体学生联名函请他“退位”和要求“改造厦大”的第一次学潮。其结果是部分师生离校，到上海另组大夏大学。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厦大学生举行罢课，表示声援。并组织学生外交后援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国学院教授鲁迅等一批学者辞职的影响下，部分学生要求改变文理科经费分配不当、改革学校不合理的制度，并主张驱逐理科主任刘某。学校当局不予理睬，结果举行罢课，爆发了第二次学潮。这两次学潮，虽然并未提出明显的革命口号，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国民党的教育统治无疑起着冲击作用，并为尔后的学生运动开了先声。

厦大成立不久，就有学生共产党员施乃铸在校学习。施乃铸是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由李达、邵力子介绍入党的，他在厦大时，传阅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革命书刊，一九二四年参与发动了改革厦大的第一次学潮。一九二六年二月，在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下，厦大学生罗扬才、罗秋天和小学教师李觉民三位中共党员，组成了厦门大学支部。罗扬才任支部书记。党组织建立后，就在校内和厦门市区开展革命工作。一九二六年底至二七年初，由罗扬才等发起组织了“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简称“非基大同盟”），并在报上出版非基专刊，揭露当时基督教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的真面目。之后，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示威游行。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进步学生继续利用纪念“五九”和“三一八”活动，开展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惨案后，厦大学生会总委员会就召开会议，通电上海学生表示慰问和声援，通电北洋政府段执政，请其严重交涉。六月五日起，又举行罢课游行，六月七日正式成立了“厦门大学学生外交后援会”，出版特刊，宣传抗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师生抗日情绪更为高涨，十月，厦大全校教职员全体发表《为日本侵占满洲敬告各友邦人士书》，呼吁“制裁日本之横暴，以维护世界之和平。”还分别成立了厦大教职工和厦大学生抗日救国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对日宣战。之后，学生抗日救国会还派代表到广州、南京请愿，要求抗日。一九三三年二月，本校学生易元勋、职员秦贤成等三人，自动加入抗战队伍，北上抗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全校教职员发起捐款，慰劳上海十九路军将士。一九三五年，全校学生召开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华北自治。一九三六年全校学生电慰绥远抗日将士，并募捐慰劳。一九三七年三月，本校师生致电“上海各界救国大同盟”，响应其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声明。

第二章 抗战时期（1937—1945）

第一节 厦大改为国立大学

一九二九年，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日货倾销的双重袭击下，陈嘉庚的橡胶企业大受亏损，他要独力维持厦大和集美学校的经费，感到困难。有人劝他停办这两所学校，他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一九三二年，他的企业陷于极度困难，外国某垄断集团要将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加以照顾，他坚决拒绝，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陈嘉庚的企业被迫收盘，他觉得“厦集二校虽可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缺如，未免误及青年。若政府肯接受厦大，余得专力维持集美，岂

不两俱有益，此乃出于万不得已之下策”。于是，他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提出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不久，得到同意，并决定由教育部委派萨本栋为校长，于暑假期间接收。至此，从一九二一年开办，至一九三七年六月，长达十六年，陈嘉庚筹备时认捐的四百万元已全数支付厦大办学。但他对厦大交给政府接办，仍感到抱憾。他说：“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事实上，陈嘉庚已为厦大的创办和存在，作出了无私的牺牲和贡献了。

第二节 学校内迁山城长汀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萨本栋受命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之翌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是年七月廿九日，萨本栋校长正式到职，三十日将私立厦大校务、财产全部接收完毕。八月，“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八月廿日至廿三日，本校在福州、厦门、上海、广东四处招考新生。廿四日，日本从厦门撤退侨民。九月三日，日寇军舰炮击厦门。萨本栋料到敌人的野心，决定将全校图书资料及仪器、标本迅速装箱，以应万一。为师生安全起见，九月四日，秋季开学时，暂在鼓浪屿闽南职业学校和英华中学部分校舍举行开学式。十一日正式上课。学生共二百八十多人，教职员二十多人。十月一日，萨校长晋省商洽迁校事宜，决定将学校迁到长汀，由省政府拨助迁移费五千元。十一月十六日，派教务长周辨明等赴长汀勘察校址。经征得该地专员同意，拨借专署地址一部分房屋为本校校舍。十二月二十日起，全校停课，开始分批迁移。不及一个月，迁校即告完毕。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先借长汀县文庙和长汀饭店为教室，开始复课。此时，到校学生为一百九十八名，教职员七十多名。二月底按期进行学期考试，并放寒假。由于战乱，学校遭逢时难，虽经迁徙，而能秩序井然，照常上课，非有精心筹划，上下协力，曷克完成。

迁校初期，首先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校舍和教学设备问题~~。萨本栋本着“学校与国家同命运不断奋斗，有计划推动各种工作”的精神，为师生们创造一个较安定的教学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校舍问题，通过接受政府拨助的部分公产房屋，并加以修理扩充，同时向群众租赁私房，并调整旧有校舍，计分为第一、二、三院。第一院包括群贤堂等数座，有男生宿舍校部机关办公室、实验室、教室附属膳厅等，及新群的操场。第二院为苍下巷万寿宫及附近房屋，为图书馆、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医院和西膳厅等。第三院为乌石山巷四十号及其空地，包括男生宿舍及校园部分。另租民族路十四号房屋数间为教员宿舍。此后，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又在北山山麓和中山公园

一带，陆续新建了一批教室和宿舍，使得学校基本具备了教学和师生生活设施的用房的物质条件。

二是图书与设备问题。由于学校及早做好转移的准备，原在厦门校址的图书标本、仪器除小部分寄在鼓浪屿外大多安全转运到汀，保存完好，损失极小。在长汀时，曾受战争的影响，还是设法从英、美、法等国购置部分书刊，使得学校拥有一个十几万册的中外文书库，和可供二百人自修的阅览厅。长汀当时尚无电灯，为解决学生晚间自修困难，学校因陋就简，安起了发电设备，提供照明用电。理工学院也陆续建立了一批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如水力实验室和机电实习工厂等。

三是经费的困难。战争带来的物价飞涨，公教人员的待遇骤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也极为困难。萨本栋校长反复强调师生要发扬勤俭朴素的作风，他在“勉励同学词”中第一条就提出：“自奉应俭约，工作应紧张，但不可伤及营养或害及卫生”。在处理校务时，他积极地向上反映，争取较多的经费来维持厦大，并尽力提高教师的薪俸；对学生则采取各种补助办法。除由政府统一规定的“战区学生贷金”和“免费生”名额外，萨校长还为学校争取“闽西学生救济金”；对战区贫寒学生，还发给棉衣补助等，帮助清贫学生解决入学经济困难问题，同时还设立“嘉庚奖学金”、“林文庆奖学金”等，鼓励优秀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此外，鼓励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如为学校抄写讲义，到附近中小学兼课等。总之，师生们在共同奋斗，共赴困难的爱国精神指引下，不计较待遇和安逸生活，“在艰危中，特别努力份内职务”（萨本栋语），为国育才，安贫乐道，发扬了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兴学精神，使战时的厦门大学赢得了海内外的称誉。

第三节 院系设置和教学活动

迁校长汀后，院系设置也逐步调整，重点是扩展理工科各系，加强应用学科的建设。一九三八年，奉令撤销法律系，原来的法商学院改为商学院，全校设三个学院九个系，即文学院（中文、历史、教育三系）、理学院（数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四系）、商学院（经济、商业二系）。

一九四〇年，原福建大学法学院并入本校，同时增设了机电工程系，理学院遂改为理工学院。后来商学院增设了会计、银行二系，其属下的经济系则并入法学院。一九四一年校庆二十周年时，全校已设有四学院十三个系，即文学院（中文、历史、教育三系）、理工学院（数理、化学、生物、土木、机电五系）、法学院（政治、经济、法律三系）和商学院（会计、银行二系）。一九四四年春，接教育部令，要本校筹设水产研究室和航空工程系，当时因萨本栋校长已准备赴美讲学，校政由理工学院院长汪德耀代

理，上述一室一系即由汪德耀直接筹办。当年秋季航空系正式开办，开始招生。由上述院系的调整扩展来看，学校私立时期的文理科，基本保持原来的规模，并有扩大，而工科则是这一时期建立基础并逐步扩展的学科。

师资问题，是迁汀后遇到的一大困难。由于学校位于偏僻山区，生活条件差，加上教师待遇低，一般教授都不愿来此任教。如一九四一年联系聘请的教授三十多人，结果到校的仅十余人，萨校长为解决这一问题，殚思竭虑，多方延聘，使得这一时期新到校任教的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如傅鹰、谢玉铭、蔡榴生、林庚、李培固、陈景磐、施蛰存、林谔、李琮池、黄开禄、顾瑞岩、汪德耀、朱家沂、李笠、虞愚、朱保训、谷霁光、王敬立、陈德恒、吴士栋、冯定璋、萧贞昌等。这一批教授“不辞跋涉，不怕冒险，不计较待遇”（萨本栋语）而来校任教，使得学校在抗战艰苦岁月里，不独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对规模的扩大和事业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教学，总的说是加强基础，注重应用，强调质量，努力提高。虽然处于战乱之中，但由于萨校长的精心擘划，师生的共同努力，教学秩序良好，学习风气较之战前更为浓厚。萨校长在勉励学生时提出：“要思想纪律化，最好去研究数理；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不动手做实验的人，试想控制大自然以造福于国家及人群。”因此，学校对学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中文和英文的学习和应用）、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能以及到工厂实习等，要求都很严格。

萨本栋强调学生首先要树立远大理想，他要求学生“要尽量利用这幸运的环境，以下个最大的决心，就学业方面，做人方面，以及后来就业方面，总之要在终身学业方面立下一个宏大的志愿”。其次，他强调要提高学习质量，他说：“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之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的不能兼顾情况之下，对于质的改良，比起量的增加，尤为重视。”

学校首先要求全体学生要学好语文和英文，强调能用本国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学识，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智能；而掌握英文则是“精付研究”国内外科科技、学术的必备的条件。所以，对新生入学的要求，首先是进行中文和英文的复试，然后按他们的程度编班，其中成绩特优者可以免修；成绩不及者必须重修；重修不及格者予以退学。对毕业生，也要进行“语文特殊试验”，学校颁布的试验办法是：学生毕业前，要能用中文在教师监督下当场用汉语白话文和文言文各写一篇文章；英文要任选一本英文专著，经教授核准，然后自行阅读，用英文写出一篇三百字的读书报告，送教师评阅认可，再进行口试。这一特殊试验，不论文科或理科，都不能或免。这一制度连续实行了数年，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为奖励制，即凡经过试验优胜者，由学校发给奖

金，以资教励。

其次，重视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学校要求理工科学生要扎实学好微积分这门课。凡这门课不及格者，不能留在理工学院，必须转到其它学院学习。对学生的实验课和实习，学校也很重视。除校内实验室和工场外，学校还要求学生利用假期，到本县或本省一些专业对口的工厂去实习，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学校还安排有经验的教授，去担任有关课程。萨本栋和先后担任教务长的傅鹰、谢玉铭以及各学院院长，都亲自担任基础课教学。

学校还重视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生自发组织的各个学会，经常请教授作学术演讲，报告研究心得和成果。有些教授还兼任学会的顾问。此外，还邀请来校访问、考察的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一九四二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来长汀，学校请他作了《造山运动与地球冷缩》的报告。一九四四年英国著名学者、近代实验胚胎学权威李约瑟博士来校，也作了多次学术讲演。同年，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长、经济学家王亚南，也来校讲“中国土地问题”和“高级经济学”两门专题课。各系学生组织的学会，如“中国文学会”、“英文学会”、“教育学会”、“数理学会”、“化学会”等，也通过开展专题讨论，出版刊物、壁报，举办各种社会服务活动等，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如法律系的法律咨询处，教育学会的社会教育服务处和平民夜校等，都办得颇出色，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可以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赛”中得到印证，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教育部于每二年举行一次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活动。竞赛的项目包括中文、英文、数学等科，以及其它系科的主要科目和毕业论文等。第一届（一九三九）和第二届（一九四一）竞赛中，厦门大学均获得国立大学的第一名。以后连续几届的竞赛，本校也名列前茅，学校因此而受到教育部通令嘉奖。

从毕业生的实际水平和他们后来的成长，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校的教学质量。抗战八年，本校毕业生约五百七十多名，他们的多数在闽粤赣三省外，也有到四川、云南、贵州大西南地区以及南洋去服务的。这时期的毕业生，由于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应用实践的能力也较强，又有吃苦耐劳精神，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战时特别需要的法律、财经、土木、机电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尤其受到欢迎。有的还未毕业，就受到有的机关单位的预聘。这一批毕业生，有的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有的在科学和文化教育战线服务，做出了成绩，有的到南洋，为发展华侨教育文化事业服务。

学校的声望日益提高，使毕业校友感到自豪。为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络，共同为谋求母校的发展，一九三九年在长汀工作的校友，首先发起组织了“旅汀毕业同学会”，并出版了旨在报道母校近况和校友动态的期刊《厦大通讯》。经过一段筹备过程，一九四〇年

四月校庆十九周年时，成立了“厦门大学校友总会”。本省各县和重庆、桂林、广东、云南、南昌等地以及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也相继成立了校友分会。校友会的成立，不仅加强了毕业生同母校的联系，提供科技文化信息，促进母校的发展，而且也体现了萨本栋校长一贯主张的摒弃“地域观念”加强团结合作的良好作风。

由于本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当时教育部通令嘉奖，肯定本校“教学认真，学风纯正”。所以战时的厦大被称为“东南最高学府”、“国内最完备的大学之一”。

第四节 学科扩展与办学特色

私立时期，厦大的学科设置，偏重于文、理两科，虽也有工学的设置，但创设时间极短，且未成教学体制。长汀时期，由于萨校长的精心擘划，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即有土木工程学系的设置。以后又陆续创办了机电、航空等系。从工科的招生来看，其发展也很快，一九四二年土木、机电二系学生七十多名，仅占全校学生总数七百多人的十分之一；而到一九四四年，工科学生比文、理、法、商都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这几个系课程设置完备，学生功课繁重，作业和实验也多，而且假期还到有关工厂实习，要求相当严格。毕业生质量高，各单位争着聘用。

战时的厦大，仍然同海外华侨保持密切联系。学校重视培养侨生，专门设“华侨特别生”名额，对他们的入学也给予多方照顾，可先编入“未列系”就读，待后参加入学考试，正式编入有关系。清贫的侨生还享受各种奖学金。当时，福建省侨民紧急救济会也关心本校侨生，拨给紧急救济费，补助在校的侨生的学习费用。

学校改国立后，教育部为纪念陈嘉庚的功绩，特设立咨询委员会，聘陈嘉庚为永久委员。本校为纪念陈嘉庚功绩，设立“嘉庚奖学金”和“嘉庚讲座”。本校还和集美学校等单位，函请教育部对陈嘉庚及其弟陈敬贤创办厦大的功绩给予“明令褒奖”，得到同意。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时，特地到长汀，受到师生热烈欢迎。校友总会出版了纪念专号。陈嘉庚肯定了“厦大有进步”。

在校的华侨学生还组织华侨学会，“借以研究华侨问题及联络华侨同学感情”。学会开展了各种活动，如举办方言讲习班，办理会友人事调查，举行假期联谊会，接待海外逃亡回来的难侨以及举行纪念活动等。学校对侨生的活动给予支持，如给予活动经费津贴，派教授担任顾问，参加侨生们的各项活动，作学术讲演等。

第五节 抗日救亡运动

长汀时期厦大，虽然经师生的戮力奋斗，教学成绩斐然。但是，在抗日烽火燃遍神州的时候，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在厦大校园里蓬勃开展，师生员工的反帝爱

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早在抗战初期，学校在鼓浪屿临时校舍上课时，厦大学生就组织了抗日救国团，在鼓浪屿举行了数次的抗日宣传，并募捐救国献金，慰劳抗战将士。学校迁汀之后，学生救国服务团为鼓起民众的抗敌情绪，又继续举行多次街头和下乡的宣传，及进行国防化学表演。一九三八年初，全校二百多名学生，组成二十个宣传队，分赴长汀和江西瑞金等地乡镇，宣传抗日。那时候，由张鼎丞、邓子恢率领的新四军二支队，从龙岩开赴皖南前线，途经长汀河田，恰好同在那里宣传的厦大学生相遇，双方还举行了座谈会。

在学校，师生们通过创办抗日救亡刊物，如《唯力十月刊》《抗战言论》，和组织各种文艺团体，如厦大剧团，铁声歌咏团等，排练抗日戏剧和抗日歌曲，到各地演出，宣传发动群众。一九三九年初，汉奸汪精卫暴露出卖国投降的面目，萨本栋校长领头同全体教授联合通电全国，严厉斥责和揭露汪贼的卖国谬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本校建立的地下组织，也开展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他们组织进步学生和职员举行“谈书会”，传阅革命书刊。一九三九年，物理系职员、共产党员陈松生，惨遭反动派的暗杀，引起全校大震动。根据当时上级党的指示，地下党的斗争必须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厦大的党组织利用级会、助教会、壁报等开展“合法”的工作。又通过各种体育文娱活动广交朋友，扩大战线。在党组织和党员的领导下，这一时期也开展了多项活动和斗争。如召开宪政座谈会，抗议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反对女子参政运动，一九四一年的“倒孔（打倒孔祥熙）运动”等。

萨本栋是一位爱国、正直的科学家，当时他虽身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和厦大三青团指导员，但为了一心把学校办好，他一方面劝阻学生不要参与政治，另方面对学生加以保护，反对政府当局在校逮捕学生。如一九四〇年“宪政座谈会”后，长汀专署指名要逮捕进步学生林汝楠等，萨本栋不同意。一九四一年夏，军警机关要逮捕几个涉嫌的毕业生，萨本栋愤怒地说：“我在校一天，绝不许任何人在校内逮捕学生，否则，我要告到中央去，即使辞掉职务也在所不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为了扩大兵源，补充抗战兵力，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本校成立了“从军委员会”，发动同学报名。全校四院十四系共有一百八十多名男女学生报名从军，表现了青年学生抗敌救国的热情。

在八年抗战中，厦大师生在后方，在前线，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第一节 复员前后

一九四四年五月，萨本栋赴美讲学，校长职务由理工学院院长汪德耀代理。翌年四月，萨本栋离美取道英伦回国，应英国政府邀请留英讲学，至八月底才返抵重庆。这期间，萨本栋因健康和其他原因，坚辞校长之职，教育部即于九月任命汪德耀继任厦大校长。

接任后，汪德耀即主持设置学校复员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着手各项复员准备工作。不久厦门光复，即派人赴漳，随同军政当局进入厦门，调查学校损失详情，同时在厦门设立复员办事处，派文学学院院长周辨明任办事处主任。

在此期间，汪德耀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后，又赴上海，洽聘教授来校任教。迨至十一月十七日，汪德耀到校，当日全体教职员开会欢迎新校长，在会上宣布拟于寒假内将学校全部迁返厦门。十九日，汪德耀校长报告聘任十名教授情况并宣布各学院院长名单及筹设海洋学系等工作情况。十二月中旬，汪德耀偕总务长赴厦门，筹划学校复员事宜。

迁校计划并不能顺利如期完成，原因是复员经费迟迟未拨，省内公路交通仍未修复，加上厦门校舍遭敌破坏严重，有的战后被充作日本战俘集中营。因此，一九四五年底，校本部仍在长汀，唯新招收的四百多名新生，暂借鼓浪屿英华中学，旭瀛书院和接收日产博爱医院、日本小学为校舍，于十二月廿四日正式上课。一九四六年二月，原建在鼓浪屿的复员处改为新生院，任命周辨明为院长，此后三年中，直到厦门解放之初，一年级新生都在鼓浪屿新生院上课。

在汀的各年级学生，一九四六年上学期功课提前结束，于六月一日开始迁回厦门。七月初，汪校长偕学校行政人员，先行离汀到厦，并正式办公。十一月中旬，迁校任务基本完成。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困难，即于当月正式上课。

厦门沦陷期间，校舍遭到严重破坏。战前厦大校舍总计四十多座，三千余间，遭战火焚毁，所剩无几。据统计，全部被夷为平地的有生物院、化学院、笃行楼、兼爱楼，白城教职员宿舍二十六座，与大膳厅、发电厂、医院、温室、植物园等。其它校舍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估计房屋损失金额达旧币四十亿元，合美金一百一十五万元。另外，设备、图书、傢具遭受损失的，达战前的七十八万元。

复员之后，学校即制订校舍修建计划，一方面修复旧楼屋，一方面根据学校规模扩大的实际需要，或扩充或新建部分校舍。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汪校长的精心擘划，因